

# 《阿Q正传》的符号化意象及其象征意蕴

吕周聚

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要:**《阿Q正传》中的阿Q、小D、赵太爷、钱太爷等人名并非现实中的哪一个具体人物的真实姓名,它们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这些符号化名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国人的国民性特征;“城”与“未庄”也并非现实社会中哪一个具体的城市和村庄的名字,它们是当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代称,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特质;“辫子”具有丰富的民族政治意味,具有符号化的功能,其去与留成为革命与否的标志。这些符号意象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具有象征功能。

**关键词:**《阿Q正传》;符号;意象;象征

**中图分类号:** I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2)03-0061-09

《阿Q正传》是鲁迅的重要作品,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人物、地方、事物,但与其相对应的人名、地名、物名等并非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具体的人物、地方、事物的名字,它们明显带有类型化、符号化的特征,成为符号化的意象,具有了象征功能。符号化意象与形象具有不同之处,形象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地理环境及事物,追求的是具象化、个性化;而符号化意象虽也用具体的物象来命名人物、地名、物名,但它追求的是抽象化、共性化。

意象与符号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意象由“意”和“象”构成,“象”即具体的物象,“意”即意念(抽象的概念),通过具体的物象来表达意念(抽象的概念)。从这一角度来说,意象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能指(signifier)指的是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ified)是“音响形象”所表达的概念,能指与所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一个能指可以聚合多个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构成一种意指(signification)关系,能指和所指通过意指方式结合成为符号,“‘意指’是一个复杂概念,既指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方式或行为过程,也指这一过程的结果: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意义”<sup>①</sup>。这种意指(表征)具有象征功能,主要是通过意象符号来隐喻作者的思想理念,“艺术的最大要件,是在具象性。即或一思想内容,经了具象底人物,事件,风景之类的活的东西而被表现的时候;换了话说,就是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而赋与这具象性,就称为象征(symbol)”<sup>②</sup>。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中的美国因素研究”(19BZW0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吕周聚,男,山东莱阳人,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黄华新、陈宗明:《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6页。

② [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文全集》第2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名字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符号。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起名字的时候都尽可能地起得有特色,或者按照家族中的辈分排序来命名,或者在名字中寄托家长对孩子的美好期望,不能与他人重名(尽管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重名的现象),这样一个名字对应一个人,名字与人之间就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人物命名的方式则有所不同,他用符号化的名字来给他的人物命名,这些符号化的名字如同讽刺漫画家笔下的画像,抓住人物的某一个特点予以突出强化,使之成为某一类人物的重要特征;又如在现实生活中给某人起的外号,能够抓住人物的长相、行为或性格的某一特点,将人物的鲜明特征概括突出出来。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喜欢给人起外号,“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总是很有趣的”<sup>①</sup>。如称严复为“不佞”,后来改称“载飞载鸣”;因蒋智由谈到服装问题,说满清的红缨帽有威仪,南昌西式礼帽则无威仪,称他为“无威仪”,因为他的思想变了。由绰号概括出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思想、性格特征,既形象生动,又趣味无穷,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得到了运用。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鲁迅具有自己的特点。他不专用一个人做骨干,或者说不用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作为原型来塑造人物,而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sup>②</sup>。这种“拼凑”的手法带有后现代“拼贴”的特征,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现实生活中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类人,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或特指性,表现出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正因如此,当年《阿Q正传》在报纸上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sup>③</sup>。当时许多人读了《阿Q正传》后都觉得阿Q与自己很像,纷纷询问作者巴人是谁,他们疑心巴人就是他们身边的某一个人,熟悉了解他们的底细,要不怎么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到小说里去?这些人之所以会有这种代入感,是因为他们在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阿Q正传》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阿Q、小D、吴妈、小尼姑等为代表的下层无产阶级,一类是以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

阿Q是低贱的代名词,是下层贫民百姓的代表,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是国民劣根性的象征,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阿Q没有姓,也没有名;没有地,也没有房子,是真正的无产者。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作者考证其名字的由来,“生怕注音字母还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sup>④</sup>。只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而这“阿”字在南方的乡间是常见的称呼,诸如阿狗阿猫之类。阿Q的名字一度成为研究者考证研

① 许寿裳:《生存,并不是苟活:鲁迅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②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526页。

③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96页。

④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514页。

究的对象,日本学者松冈俊裕曾考证阿Q的名字为什么是阿Q而不是阿K,他梳理了历来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周作人说据鲁迅自己说,Q字下面的~很像辮发,辮发的意思包括在Q字之内;竹内好认为Q的英文发音与辮发的英文Pueue[kju:]同音;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推测鲁迅把Don Quixote(唐吉珂德)姓名拆开,Don用于小D,Qui用于阿Q,xote藏在其他隐藏的地方;陈云坡在《鲁迅家乘及其轶事》中认为Q是Question的词头辅音。<sup>①</sup>同一个Q,大家的理解不同,说明阿Q这一名字具有说不尽的复杂内涵。关于阿Q的身份也是说法不一,有的人说他是农民,有的人说他是雇农,有的人说他是市民,有的人说他是流氓无产者,大家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其身份复杂难定,它具有农民、雇农、市民、流氓无产者的综合特征。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既是阿Q的精神特质,也是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精神特质。从这一角度来说,阿Q是一个符号化的意象,在他身上表现出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阿Q是中国人,他身上体现出的自然是中国的国民性。同时,阿Q又是世界的,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在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身上也有所体现。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后认为:“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sup>②</sup>换言之,在法国人身上也可以看到阿Q的影子,这说明阿Q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具有普遍性,是人性的弱点。

在封建社会,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饱受歧视和压抑,而吴妈和小尼姑又是下层女性的代表,其地位在阿Q之下,沦为阿Q欺凌的对象。吴妈是赵家唯一的女仆、孤霜,被阿Q求爱后大哭,要寻短见。小尼姑是出家人,阿Q在平时看见小尼姑时一定要唾骂,对她动手动脚,伸手去摩她新剃的头皮。阿Q对女性充满了偏见,在他看来,“凡小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sup>③</sup>。阿Q认为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阿Q的这些观念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妖魔化。小尼姑和吴妈的遭遇,充分体现出中国女性的卑微地位和悲惨命运。她俩是那个时代成千上万女性的代表,这两个名字遂成为受歧视、受压抑、被侮辱女性的代名词。

鲁迅为何要塑造阿Q、小D、吴妈、小尼姑这样的下层人物形象?他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认为文学必须为人生、并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④</sup>。从本质上来说,阿Q、小D、吴妈、小尼姑等是同一类人,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也是鲁迅对国人的基本态度。

小说中还塑造了赵太爷、钱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上层社会的代表,是社会顽固势力的象征。鲁迅为何让这两个家族一个姓赵,一个姓钱?这都是讲究的。赵姓,在百家姓中排在第一位,姓赵的人多,“第一”也就表明了其地位的显赫与荣光,赵家在未庄享有特殊的地位与权力,姓赵成为一件很光荣的事情。阿Q在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喝了两碗黄酒后说自己原来是

① [日]松冈俊裕:《〈阿Q正传〉浅释——“未庄”命名考及其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② 许寿裳:《生活,并不是苟活:鲁迅传》,第59页。

③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5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赵太爷的本家,且辈分比秀才长三辈,结果阿Q被地保叫到赵太爷家里训了一顿,并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赵姓成了赵太爷的垄断专利,别人不能随便姓赵,像阿Q这样的穷人就不配姓赵。阿Q退出赵家后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sup>①</sup>。由此可见,赵姓是权势、地位的象征,不仅赵太爷这么认为,而且大众也都这么认为。赵太爷是真理的象征,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阿Q挨了赵太爷的耳光后产生了一种荒诞的效果,未庄的人不仅没有笑话他,却仿佛格外尊敬他,“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一些稳当”<sup>②</sup>。这充分体现出赵姓在未庄的赫赫威严。而钱姓也颇为了得,钱在百家姓中居第二位,声名显赫;钱又是人们喜欢、向往的东西,有了钱就有了地位和权势,就可以支配统治别人。这样,赵太爷、钱太爷就成了权势、地位、名望的象征,他们代表中国的统治阶级,在社会上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

赵、钱两家的儿子的名字也非常有趣。赵太爷的儿子中过秀才而被称为秀才,钱太爷的儿子曾出国留洋而被称为假洋鬼子。秀才是旧式知识分子的代称,假洋鬼子则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称,他们虽都是知识分子,但后者向来瞧不起前者,因为秀才已经成了过去时,而留洋才是社会时尚。当革命来临时,给他们提供了“咸与维新”的机会,他们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结伴到静修庵里革命,砸碎了龙牌,偷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他们花钱买“银桃子”,摇身一变成了自由党。他们是革命的投机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两类知识分子的共性,他们遂成为类型化知识分子的象征。

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以阿Q、小D为代表的下层贫民形象和以赵太爷、钱太爷等为代表的有钱人形象,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揭示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形态。许寿裳认为《阿Q正传》是一部讽刺小说,“鲁迅提炼了中国民族传统中的病态方面,创造出这个阿Q典型。阿Q的劣性,‘仿佛’就代表国民性的若干面,足以使人反省,他对于阿Q的劣性像‘精神胜利法’等等,当然寄以憎恶,施以攻击,然而攻击之中,还含着同情。因为阿Q本身是一个无知无告的人,承受了数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一直被士大夫赵太爷之流残害榨取,以至于赤贫如洗,无复人形。鲁迅对于那些阿Q像赵太爷之流,更加满怀敌意,毫不宽恕。他利用了阿Q以诅咒旧社会,利用了阿Q以衬托士大夫中的阿Q以及人世的冷酷,而对于阿Q的偶露天真,反觉有点可爱了”<sup>③</sup>。许寿裳在谈到《阿Q正传》时认为:“他映写了辛亥革命前夜的时代背景,农村的破产、失业、饥饿、榨取者和被榨取者的斗争、土豪劣绅对于革命的厌恶、贪官污吏对于革命的投机,以及阿Q及周围的人民对于革命的憧憬和模糊的认识,再穿插着革命的不彻底及其妥协精神、封建社会的崩溃。总之把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完全发表出来了,宜乎识者看了这篇写实作品,认为世界的了。”<sup>④</sup>阿Q、小D、吴妈、小尼姑、赵太爷、钱太爷、秀才、假洋鬼子都是类型化的人物形象,其名字具有符号象征功能,通过这些名字(人物)呈现出复杂的社会形态,写出了中国人复杂的面相。

①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13页。

②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0页。

③ 许寿裳:《生活,并不是苟活:鲁迅传》,第156页。

④ 许寿裳:《生活,并不是苟活:鲁迅传》,第154页。

## 一

人们生活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便要给其所生活于其中的地理空间命名,以宣示自己与这个地理空间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给地理空间命名的方式有很多,但这些方式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要抓住这个地方的地理文化特征,突出其独特性,或以姓氏命名村镇,或以地理特征命名地名,这样既显示出其文化内涵,又方便记忆。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个地名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地名要有具体性和特指性,一提起这个地名,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某一个相对应的地方,不会产生混淆。而《阿Q正传》中的地名——未庄和城——缺少这种具体性和特指性,它们只是抽象的符号,具有隐喻功能。

小说中这样描写未庄:“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sup>①</sup>小说中的“未庄”是鲁迅虚构出来的一个村庄,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带有乌托邦的性质。<sup>②</sup>对于“未庄”的命名,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认为,“鬼”=“禺”=“畏”,“畏”与“未”同音,因此“未庄”就是“鬼庄”。<sup>③</sup>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松冈俊裕教授认为,“未”含有“还没有”的意思,“如果这个‘未’字在这里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就能理解‘未庄’就是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有缺陷的村庄”。他由此联想到周作人翻译的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中的“羊头村”,认为“羊头村”就是“虚有其表村”,而“未”也有“羊”的意思,因此“未庄”也就是“羊头村”。<sup>④</sup>日本学者将考据与联想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点,即未庄并不是当时现实中哪一个具体的村庄,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所在。可以说,未庄是中国南方水乡乃至中国乡村的缩影,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意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象征。未庄的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封闭守旧,愚昧落后。作为未庄人,阿Q很鄙薄城里人,因为未庄人把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叫“长凳”,而城里人却叫“条凳”;油煎大头鱼,未庄人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这在阿Q看来,都是错的,是可笑的。

城,是城市的代称。现实生活中的城市,都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如上海、北京、杭州等等。小说中的“城”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名字,只是一个泛指代称,这样“城”就成了一个抽象名词,成了一个城市符号,它朦胧模糊,具有所有城市的特征,成了所有城市的隐喻。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城市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明、现代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象征。城市是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出现的,如果说农村是传统文化的温床,那么城市则是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城里有各种新生事物,成为农村人向往、羡慕的理想之地。阿Q进了几回城便很自负,回来后瞧不起未庄人,认为未庄人都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阿Q因为向吴妈求爱遭到全庄人的抵制,无法在未庄生存下去,只好到城里当小偷为生,开了眼界,认为城里也偶有大大可佩服的地方:未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

①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1页。

② 今天绍兴有一个新未庄,是当地政府根据《阿Q正传》中描述的未庄风情,投资2亿元修建而成,于2002年2月20日落成,将虚构的未庄变成了现实。

③ 参见[日]丸尾常喜:《“人”“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④ [日]松冈俊裕:《〈阿Q正传〉浅释——“未庄”命名考及其它》,《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的,什么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的十几岁的小乌龟子的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王”。因为很多乡下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城,所以,进城后的阿Q在未庄人眼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作者并没有具体描写阿Q所进的城是什么样子,而是通过写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的变化来表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sup>①</sup>他走近酒店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一改原来赊帐的习惯,用现钱打酒,堂倌、掌柜、酒客、路人都对他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城市改变了阿Q受人歧视的命运,他的人生中一度出现了“中兴”。他从城里带回来的蓝绸裙、大红洋纱衫等新款衣服,都是乡下人所罕见的,他的大名因此传遍未庄的闺中,未庄的女人们眼巴巴地想见阿Q,要从阿Q那儿买便宜又好看的衣服,她们见了阿Q不但不逃避,有时阿Q已经走过了还要追上去叫住他,问他是否还有新款的衣服,连赵家人也想要从阿Q那买点好东西,并破例邀请阿Q到府上来。阿Q只是进了一次城,与城发生了关联,其身份、地位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见城市文明对乡下人的吸引力之大,也可发现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压迫与吞噬。

在中国近代史上,城市是革命的发源地。阿Q给人们讲在城里看见过杀革命党的头,听的人都悚然而且欣然。传说革命党进了城里,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当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也害怕革命时,便对革命有些“神往”了,“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sup>②</sup>。他喝了两碗空肚酒,飘飘然起来,觉得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得意之余,他禁不住大声嚷道:“造反了!造反了!”未庄人用一种惊惧的眼光看他,他感觉非常爽,连赵太爷也怯怯地与他套近乎,称他“老Q”。城是阿Q的中兴之地,他因进过城、看过杀革命党的头、向往革命而受到庄里人的另眼相待;城也是他的丧命之地,他因向往革命而被当作革命党抓到城里,最后被革命党稀里糊涂地杀了头,成了革命牺牲品。

小说中的“未庄”与“城”是20世纪初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象征,“未庄”与“城”之间的矛盾冲突、互动显示出当时中国的社会特征——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城市是革命的发源地,城市的革命波及到农村,中国数千年来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裂变,出现了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现代文化正在渐渐地代替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

### 三

《阿Q正传》中多次出现的辫子、头发等固然是现实中的物象,但作者并没具体描写人物头上头发、辫子的颜色、形状,而是强调其共性特征,这样辫子、头发也就成了一种符号化意象,具有特殊的象征内涵。

头发是生长在人的头部的毛发,主要功能是保护头部,但中国的儒家文化却赋予其特殊的文化

<sup>①</sup>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33页。

<sup>②</sup>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383页。

功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sup>①</sup>。这样,头发便与孝道联系起来,成为孝文化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赋予头发以更多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头发与国家、民族、政治、革命发生了密切关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人发明一种髡刑,即把头发剃光的刑罚,头发的有无遂成为一种奖惩的方式,剃光头成为犯罪的象征。满族入关后颁布“剃发令”,强迫百姓遵从满族发式,即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头发结辫垂于脑后,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从而引发汉人的强烈反抗,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后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倡导留发而不结辫,被称为“长毛”;晚清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口号,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无论是“光复汉族”还是“驱除鞑虏”,其本质都是“反清复明”的革命,其中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剪辫子,剪辫子遂成为革命党的标志。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多少中国人因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受苦、受难甚至死亡,头发、辫子成为国家、民族、政治、百姓命运的象征。

鲁迅生活在晚清时期,自然也留着辫子,并且已经习惯了留辫子,“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sup>②</sup>。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传入中国,中国人引以为荣的辫子,成为西方人讥笑、嘲讽的对象,辫子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鲁迅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时就听到一句洋话: Pig-tail,即猪尾巴,他开始觉得留辫子并不雅观;在日本留学时,穿着胡服、留着长辫被日本人讥笑为“跬跬婊子”,这对鲁迅来说也是一种屈辱。他在日本留学时参与了留学生们组织的反清活动,积极响应邹容等人倡导的剪辫号召,成为弘文学院江南班里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但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便又入乡随俗,被迫装假辫子,加入了辫子大军。后来他索性不装,但走在路上却受到特殊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鲁迅在绍兴饱受无辫之灾,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sup>③</sup>。剪辫子的复杂经历成为鲁迅心中的一个巨大创伤,对鲁迅来说,辫子是一种耻辱与失败的象征,他要通过辫子来“舒愤懑”。作为一个意象,“辫子”经常出现其作品之中,如《头发的故事》《风波》等,在这些作品中,“辫子”无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辫子是《阿Q正传》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意象,带有符号化的特点。阿Q有一根黄辫子,这根辫子对阿Q来说却是屈辱的象征。阿Q成为未庄闲人取乐的对象,他们嫌只撩他不过瘾,终而至于打,阿Q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们才心满意足地走了;阿Q与王胡打仗,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去照例碰头;阿Q与小D进行“龙虎斗”,阿Q伸手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辫子

① 汪受宽译注:《孝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②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193页。

③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第195页。

成了他们攻防的要害部位。对阿Q来说,辫子只是用来被人抓住往墙上碰头的,或是用来打架的攻防要害,成了被动挨打的象征。

钱太爷的大儿子被未庄人称为假洋鬼子,他先跑到城里进洋学堂,后来又跑到东洋,半年之后回到家里时辫子不见了。为此,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儿子的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留长再说了。儿子有辫子便可以做大官,这自然是钱太太的美好愿望,却说明辫子是清朝时做官的一个首要条件,它是对清朝政府驯顺与服从的象征。剪辫子是对清朝政府的叛逆和反抗,是革命的象征。那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迫于社会压力,被迫又戴上假辫子,穿着洋服,便被人们称为假洋鬼子。阿Q非常瞧不起假洋鬼子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有一条假辫子,在阿Q看来,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

在辛亥革命时期,辫子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与否的象征。小说描写革命来了之后,人们的辫子所发生的变化:赵秀才消息灵通,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假洋鬼子,成了情投意合的革命同志,相约去革了静修庵的命;革命党进了城,城里倒没有什么大异样,只有一件可怕的事——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几天之后,未庄里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的逐渐多了起来,最先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Q。阿Q便也学着用一支竹筷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小D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阿Q将辫子盘在头上放胆地在大街上走,人们也看他,然而并不说什么话,这令阿Q很不平,当他听说秀才托假洋鬼子到城里用四块洋钱买了一块“银桃子”的传说之后,便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受冷落的原因: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当他去和假洋鬼子商量革命时,却被假洋鬼子赶了出去——不准他革命。阿Q因向往革命而被革命党当作抢劫赵家钱财的同伙抓到监狱里,在大堂上审问他的把总是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大堂两旁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中也有满头剃得精光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把总虽是清代最低一级的武官,却是城里的实权派,他不将举人老爷放在眼里,表面上和气,心里却充满杀机。在如何处理阿Q的问题上,他和举人老爷有不同的意见,举人老爷主张第一要追赃,把总主张第一要示众,因为他做革命党还不上二十天,就发生了十几件抢案,并且全不破案,非常没面子,要通过枪毙阿Q来惩一儆百。把总的光头似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把头发剃光,是革命彻底的标志,只有剃光了头发,才能有机会成为把总。

头发、辫子对中国人来说不仅具有生物学、美学的意义,而且具有民族学和政治学的意义。留辫子本来是满族的生活习俗,但满族入关、统治中原后却强行在全国推行这一习俗,强迫汉人接受这一习俗,留辫子遂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典型特征。当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向西方打开,无论是西方人进入中国,还是中国人进入外国,中国人头上的辫子都成为洋人嘲笑的对象,辫子成为中国人愚昧、落后的象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辫子的去与留也成为大变局的重要构成部分。通过辫子,能够折射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折射出中国人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如果说留辫子是保守的标志,将辫子盘在头上是改良的标志,将辫子剪掉一半是革命的标志,那么将头发剃光则是彻底革命的标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阿Q正传》中的阿Q、小D、吴妈、小尼姑、赵太爷、钱太爷等人名并非

现实中的哪一个人物的真实姓名,它们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这些人名对应着某一类人物,体现出中国人的国民特质。茅盾认为“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现代青年是“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sup>①</sup>。茅盾的话带有预言性,因为阿Q并没有死去,其精神胜利法成为一种文化遗传基因在中国人身上代代相传,即便在今天,我们仍能在部分国人的身上看到阿Q的影子。阿Q、小D、吴妈、小尼姑、赵太爷、钱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人物形象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些名字成为一个个象征符号,成为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的隐喻;同样,“城”与“未庄”也并非现实社会中哪一个具体的城市和村庄的名字,它们只是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代称,呈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特质,尤其是未庄,成为中国落后乡村的代名词;辫子也具有符号化的功能,它是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辫子的去与留成为革命与否的象征。这些符号化的意象具有象征功能,阿Q、小D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者,吴妈、小尼姑代表备受歧视与压迫的女性,而赵太爷、钱太爷代表中国的上层统治阶级,假洋鬼子与秀才则代表新旧知识分子;“城”是中国城市的象征,“未庄”则是中国广大乡村的象征,二者合起来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部;辫子具有丰富的民族政治内涵,它的去与留则成为革命与否的象征。鲁迅发明创造出了这些意象符号,它们无不具有抽象概括功能,它们综合在一起呈现出当时中国荒诞复杂的社会现实。这些符号意象既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鲁迅用这些符号意象进行叙述,构成一种符号叙述,赋予这些符号意象以特殊的文化意味,通过这些符号意象表达自己对中国国民性、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思考,呈现出复杂而又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责任编辑:冯济平

## On the Symbolic Images and Their Symbolic Implication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Lv Zhouj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Ah Q, Little D, Uncle Zhao, Uncle Qian and other names in *The True Story of Ah Q* are not the real names of specific figures in reality. They are just abstract symbols with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reflect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people. Rather than the names of specific cities and villages in real society, "Cheng" and "Weizhuang" are the names of Chinese villages and cities at that time, showing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Braids, with rich national political meaning, perform a symbolic function. Preserving or eliminating them become the yardstick to judge whether a person is a revolutionary. These symbolic images from reality can transcend reality and have symbolic functions. Through these symbols and images, Lu Xun expressed his profound thoughts on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revealing his complex and profound thoughts and philosophy.

**Key word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symbol; image; symbol

<sup>①</sup> 茅盾:《论鲁迅》,《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